



文艺论丛

10

文艺论丛

·10·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朱展程

文艺论丛

(第十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06,000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册

书号：10078·3147 定价：1.20元

目 录

- 周恩来同志与社会主义文艺·····顾 骥 朱颖辉 (1)
- 论短篇小说的艺术构思·····马振方 (38)
-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谈凤樑 (67)
- 论阿Q和阿Q精神·····陈安湖 (94)
- 遍借金针 转益多师
——略论《李自成》对艺术传统经验的继承和创新
·····吴功正 (132)
- 试论《暴风骤雨》·····马焯荣 (153)
- 试论《水浒》的忠义·····邓绍基 (184)
- 重评《三国演义》
——兼评《评〈三国演义〉的尊孔反法思想》·····陈 辽 (198)
- 论艾青的诗歌艺术·····骆寒超 (216)
- 回忆郭老和群益出版社·····吉少甫 (256)
- 《孟浩然诗选·后记》(节录)·····陈贻焮 (270)
- 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陈允吉 (280)

- 试论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潘必新 (308)
- 从形象思维论狄更斯的创作……………孙 梁 (330)
- 开向生命之窗
- 谈罗丹的艺术观……………彭启华 (351)
- 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德国〕海伦·娜丝蒂兹著
- 宗白华 译 (378)

周恩来同志与社会主义文艺

顾 骥 朱颖辉

(一)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我们党的伟大的文艺家。他早年曾从事新(话)剧活动，并写过一些深沉悲壮的古体诗和热情奔放的白话诗，有很好的文艺素养。从抗日战争时起，周恩来同志更多地注意了文艺工作。无论是在陕北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的武汉、重庆，周恩来同志都热忱地关怀革命文艺事业，指导革命文艺运动。建国以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一直分管文艺工作。从建国前夕主持召开第一届文代会，到去世前几个月在影片《创业》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竭尽心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一位伟大园丁。他在这块园地上付出的辛劳，作为他叱咤风云、壮伟雄奇的光辉一生的重要篇章，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人民心中。

一九四九年七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来自老解

放区和新解放区的两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为会议作了报告，阐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若干问题，指出了在民主革命接近最后胜利的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战斗任务。建国初期，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大力发展新文艺的同时，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戏曲遗产的整理改革工作。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亲自签发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著名的“五·五”指示。一九五二年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又作了重要的讲话，系统地论述了戏曲改革工作的方针、任务。一九五三年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论述了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一九五六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年头。这一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这也是指导文艺工作的正确方针。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周恩来同志一贯坚定地加以维护。这一年，周恩来同志三次观看了浙江昆苏剧团在北京演出的《十五贯》，赞扬这出戏的整理改编，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九五七年北京中国画院成立时，周恩来同志亲临致贺，强调美术事业要“百花齐放，众美争妍”，要发展绘画流派。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文艺界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现象，这是左倾错误思潮对革命文艺路线的严重干扰。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在极左思潮兴起的形势下，周恩来同志砥柱中流，坚持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召集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坚定地主张要坚持

“鸣”和“放”的方针，指出不能忘记党的整风，党员领导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承认，进行自我批评，加以改正。他还对外行与内行的关系、文艺创作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被左倾思潮搞乱了的问题，作了辩证的分析。左倾错误思潮在一九五八年，以形而上学的否定文艺特殊规律的形式表现出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讲了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但是，这个切中时弊的重要讲话，却受到了某些人的抵制，在他们控制的地方，被打入了冷宫。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蔓延起来的左倾错误思潮，给党的文艺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害。为了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纠正左倾错误倾向，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六月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二月对戏剧工作者的讲话以及同年三月在广州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都是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文献。周恩来同志科学地总结了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强调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周恩来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新的历史时期中文艺工作遇到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深刻阐明了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六十年代初，江青和那个“理论权威”插手文艺界。他们先是吹捧坏戏，反对“推陈出新”的方针，从右的方面进行干扰。一九六二年后，他们却打着大抓“阶级斗争”的旗号，制造了小说《刘志丹》大冤案，变本加厉地煽动极左思潮。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三年的文艺工作者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和文联三届全委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一九六四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顶住了越演越烈的左倾狂潮的压力，辩证地分析了当时文艺战线的形势，实事求是地提出

文艺战线努力的方向。既顾全大局，又坚持原则。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动乱中，文艺界大权被江青一伙篡夺，文艺界被实行了“全面专政”。周恩来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他们进行了斗争。一九七〇年七月，周恩来同志接见驻京部队文艺战士时，指出当时文艺上一些不良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明确提出，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一九七三年元旦在接见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时，面责江青，指出他们搞的文化专制主义造成文艺作品少的严重现象。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重病在身，仍然以其对党的事业的赤诚和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支持文艺工作者在影片《创业》问题上同“四人帮”展开斗争。历史事实证明，周恩来同志在长期领导文艺工作中，在同文艺运动存在的右的倾向、更多是同“左”的倾向的斗争中，坚定地执行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艺路线。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周恩来同志建国以来的文艺思想与实践，是人民的好总理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文艺思想与实践，继承和发展这份精神财富，对于我们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文艺战线上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是清除林彪、“四人帮”“左”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

周恩来同志建国以来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现仅就以下三个根本性问题，谈谈我们的一些认识。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

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因此，在理论上透彻地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提出一个准确的科学的行动口号用以指导实践，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关系甚大。这方面，周恩来同志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光辉思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于社会主义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多年来，我国普遍沿用的提法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三十年来文艺运动的实践证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作为规范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口号，则还需要补充和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判断得失，归根到底，是要立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但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阶级社会里，人民群众被剥夺了享受文艺的权利，而文艺，也成了少数剥削者压迫者垄断的专利品。在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时代，文学作品“主要地是供给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当时，工人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熟，还没有成批出现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只要求作家正确地表现工人阶级，对未来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还未及作出明确的详尽的论述。到了列宁的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空前高涨。在这种条件下，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指出无产阶级文学不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和“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至此，文艺的服务对象就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的《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实际，进一步透彻地解决了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正是对毛泽东同志上述思想的一种概括。这个提法当然是对的。因为工农兵是人民大众的主体，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所以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就在理论上抓住了重点，抓住了主要矛盾。从实践上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符合了工农大众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要抬头的历史要求，在开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面，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解放初期，正值工农大众扬眉吐气、在政治上彻底翻身之时，从文艺上明确提出为工农兵服务，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个提法并未能完整地准确地体现出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原意。不错，毛泽东同志是强调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但我们不应忘记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即“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可见，工农兵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但还不是人民大众的全体；首先是为工农兵，也不等于仅仅是为工农兵。意思是十分清楚的。我国三十

年文艺运动的实践证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虽然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但还未能充分表达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对象的全部内容。

既然如此，我们可否仍然沿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完整提法，来规范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呢？当然，比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毛泽东同志自己表述的思想是很科学的。三十七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基本思想并没有过时。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反复阐述的基本思想就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个原则今天没有变，而且永远也不能变。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文艺与人民的这种密切联系，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本质特征。但是，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的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早已结束，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大众的具体内容也起了变化。构成人民大众主体的工农兵，已经不同于三四十年前的工农兵。广大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成为恩格斯早就期待过的那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在实现“四化”的宏伟事业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内的社会阶层，都是促进“四化”的积极力量，都属于我们的文艺为之服务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条件变化了，对象不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因此，我们在切实遵循毛泽东

同志阐述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不应该把过去提出的有着许多历史条件限制的个别论断，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应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不断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为了满足这一历史的要求，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一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周恩来同志的这一著名论断，是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解决社会主义文艺服务对象问题的正确方针。它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的概念，准确地概括了今天社会主义文艺的全体服务对象。它把“为工农兵服务”强调地摆在首位。这样，就既突出了重点，又顾及了全般。既反映和抓住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髓，又使这一论断赋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带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具体性。比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它更全面，包容了更为丰富生动的内容；同时它也突出了我们文艺的工作和服务的重点，闪耀着唯物辩证法思想光芒。多年来，由于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尤其是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周恩来同志的论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宣传。我们今天应当引为教训，应当大力宣传，大力贯彻，按照它所规定的正确方向和工作重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周恩来同志对社会主义文艺方向问题的阐释，使许多文艺工作的具体问题都变得容易解决了。比如文艺作品的人物塑造问题，到底什么人可以成为作品的主角呢？在“四人帮”独霸的文坛上，非工农兵的其他人民群众，只能充当配角靠边站，甚至

还往往作为反面人物被实行“全面专政”，理由似乎是如此方能体现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又比如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问题。诚然，到工农兵当中去，无疑是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是否只有下厂下乡下连队才算是深入生活，而到其他战线、同除工农兵以外的人民群众接近，就不算是深入生活了呢？显然，这都是不对的。虽然对于这些问题都还需作出深入的探讨和说明，但是，方向问题的解决，已为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正确的途径。就此而言，周恩来同志根据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科学地阐释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问题的贡献是不应低估的。

明确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还必须进一步解决如何服务的问题，这样，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为此，周恩来同志又提出：“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究竟如何服务呢？他指出：“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接着，就对如何用文艺去服务的问题，展开了精辟的论述。

写到这里，我们又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历史功绩，就是密切结合当时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提出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和新时代的群众结合，改造世界观这个关键问题，从而透彻地解决了为谁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的根本问题，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周恩来同志在建国以后针对变化了的情况，也论述了这些根本问题。对比一下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共同的文艺问题作出的论述，从中引出必要的教益，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如何服务的问题时，着重阐

明的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指出两者的辩证关系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他认为当时第一步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他还强调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都不能离开工农兵群众的基础和他们前进的方向，要作到“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总之，毛泽东同志当时是主张通过普及和提高的正确结合来解决如何服务的问题的。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主张，完全是有的放矢，完全是符合延安文艺界的状况的。当时，大批文艺工作者满怀政治热情，从上海亭子间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投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是，许多同志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身上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严重地轻视了普及工作，不适当地过于强调提高。比如鲁迅艺术学院就曾一度热衷于“关门提高”，专门去进修一些脱离当时延安生活和斗争实际的古典文艺作品。文艺界的这种状况，与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和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战争极不协调，因此，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准确地抓住了这一倾向性问题，予以透辟的剖析，正确地解决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具体办法和道路问题。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文艺工作者端正了思想，走出“小鲁艺”，来到“大鲁艺”，投身到工农兵群众之中，陆续创作出了《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暴风骤雨》等一批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将近二十年以后，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同志又论述了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他除了仍然十分强调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以外，还强调要通过文艺的形式去服

务。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普通常识问题。为什么周恩来同志抓住这个本应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作了如此强调、如此详尽的论述呢？难道还有什么人连“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的道理都不懂吗？

事实正是这样。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人只是口头上懂得，而实际上却不懂得。建国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继续批判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等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观点，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对于忽视和抹煞文艺特殊规律的“左”的理论却警觉不够，批判不力，一个时期以来，产生了许多新迷信、新框框、新教条，“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动辄“右倾、保守”、“人性论”，文艺创作形同“刀刃上跑马”，人人自危。这样一来，使文艺是否通过文艺形式去服务也竟然成了问题，文艺界出现了不敢谈艺术的怪事。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愤慨地指出的：“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总之，事情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文艺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周恩来同志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大无畏的气概，抓住了这个错误倾向，振聋发聩地大声疾呼：“要破除新的迷信，再一次解放思想。”这就是他把正确解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作为解决如何服务问题的关键而详加论证的深刻的历史背景。

政治与艺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当然，这个政治，是指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任务，是指革命的总任务、总政策，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或方针政策，不是指某一个

政治运动。文艺为政治服务，说到底是为革命的根本任务、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而不是要求把文艺变成具体政策条文的图解。在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是从属政治的。但这绝不等于说艺术是无足轻重的。周恩来同志为了教育文艺工作者重视业务、重视艺术，曾经这样辛辣地讽刺了那些空谈政治的人们：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这样的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道理真是讲得透彻极了！多年来，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搞得十分混乱。政治标准变成了“唯一”，政治代替艺术、取消艺术的倾向有所泛滥。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两个标准，是指人们接受和评价文艺作品而言的。在进行文艺批评时，人们往往把作品的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分解开来，进行评议，而且常常要把前者放在第一位，把后者放在第二位。但是不应忘记，世上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谁都不可能见过什么抽象的政治、抽象的思想，也不可能见过赤裸裸的艺术形式。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艺术品中，政治与艺术总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们的关系是化学的化合，不是机械的混合，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而文艺之所以是文艺，则首先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存在形式——文艺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性就不仅不是第二位的東西，而且甚至是前提、是基础的东西了。这一点，周恩来同志说得很清楚：没有文艺的形式，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又说：“标语口号不是文艺。”“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呢！”显然，他在这里是把艺术性看作是文艺本身存亡攸关的东西，是文艺赖以成为文艺的要素。这种看法，击中了一切左倾高论的要害。在左倾思潮风行一时的当年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来，的确是坚